

美國經濟前途決定於生產力

陳 元

困境與對策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卡特向美國國會提出一九八一年度預算案，赤字達一五、七七三百萬美元，這是擴張性預算。可是，到三月上旬，勞工部報告一月份的膨脹率達一·六%，按複利折合年率爲一八·二%，接着，二月份膨脹率是一·五%，三月份是一·四%，折合年率都高過戰後膨脹年率最高的一九七四年的一二·二%和一九七九年的一三·三%^①。另一方面，四月七日勞工部報告，三月份失業率爲六·二%，高於二月的六%，亦即增加三十萬失業人數。其他實質指標 (Real indicator) 也顯示衰退業已開始：(1) 三月份最後十天的汽車銷售量僅達年率六百萬輛；(2) 二月份新建築支出減少四%，工廠所收訂單減少〇·六%；(3) 三月份房屋開工年率較二月份的一·三百萬座減少甚多；(4) 敏感性原料價格三月底較二月中旬下降八·一%，顯示需要減少；(5) 一般利率水準雖仍居高而短期年率則已下降；(6) 聯邦準備制度緊縮信用的措施在三月已見效果，貨幣供應增加年率下降三·一%^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根據商業部資料估計，一九八〇年第一季的國民生產毛額的產量年率是二四、六八三億美元，第二季衰退開始降爲二四、四四四億，第三季爲二四、一三七億，第四季爲二三、九一六億，一九八一年第一季爲二三、八一三億，四季連續下降三·五%，一九八一年第二季將開始回升。並估計，到一九八〇年底失業率將達八%^③。

卡特也於四月十八日在記者會上宣佈：「經濟可能已經進入衰退」(按：「衰退」的定義是國內生產毛額下降連續兩季)，

註① 以上統計數字以一九八〇年一月美國政府印務局所出版「總統經濟報告」爲主。

註② "The Recession is Here-Finally", *Business Week* April 21, 1980, pp. 56-57.

註③ "Economy Out of Control",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24, 1980, pp. 20-21.

「但將為溫和而短暫的」，並堅持壓低膨脹率仍為首要目標。他估計，假使今年世界油價上漲不超過二〇%，不像一九七九年那樣超過一〇〇%，假使房地產抵押利率能下降二%，則膨脹年率可以減少八%而為一六·八%^④。

衰退的深度和歷時的長短，美國各方面的估計頗不一致；但是，膨脹率空前已屬事實。尤其是，七〇年代以來，平均膨脹率遠比前此兩個年代為高。美國天然資源較其他工業國豐富，當一九六〇年代上期，其膨脹率水準和西德不相上下，屬於最低的一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就逐漸增高，到一九七四年受石油漲價四倍的衝擊，當年膨脹率達一二·二%而經濟成長率降為負一·三%。一九七五年膨脹率稍降為七·〇%，經濟成長率也改善為負一·一%。後此三年的膨脹率分別為四·八%、六·八%、九%和一三·三%，而經濟成長率則分別為五·七%、五·三%、四·四%和二·三%^⑤。情勢有每況愈下之勢。這時，為壓低膨脹率就必須犧牲成長率；如提高成長率，就不能不放鬆膨脹率。假使歸諉其原因於石油漲價，則一九七五到七八之間，按美元匯率計算，國際石油並沒有漲價。顯然，有其他原因存在。針對實際問題，不僅美國政府決策為難，而各界人士和專家們的意見也極不一致。

當三月上旬勞工部報告一月的膨脹年率達一八·四%時，美國各方都期待着卡特會提出適當對策。到三月十四日，卡特終於在記者會中宣佈他的反膨脹計劃，包括六點：(1)一月二十一日所提出的一九八一年度預算案的赤字減少一三〇億美元，收入較預算案增加一四〇億，一九八〇年度現行中預算赤字由預定的三九八億美元，減少為三五〇億。(2)由五月十五日起，進口石油每桶徵收臨時捐四·六二美元，也就是每加侖一〇美分，要求國會通過提高汽油和柴油稅每加侖一〇美分以代替臨時捐。(3)開始扣繳聯邦利息和股利所得稅一五%，使在一九八一年度徵收三四億美元。(4)透過聯邦準備制度採取緊縮信用措施：要求信用卡公司、銀行和其他大貸款機構對消費者約束新信用，但不包括購買汽車、房屋抵押和購買其他耐久性貨物的貸款；約束貨幣市場的信託基金；以及指導貸款機構緊縮對投機冒險的貸款。(5)減少聯邦對州與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在原定六九億美元中減少一七億，凡對經濟發展、公園修建、污染控制、公路構築、公共勞務、大眾傳播和法律推行的補助都予減少。(6)花費過大的福利制度的改進予以延展，減少對心理衛生計劃和治療酗酒者的補助，削減對小企業和家庭修繕的貸款。

卡特堅持一貫的主張，不採取對物價和工資的直接管制辦法，而採取強烈的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對於當前應採的經濟對策，美國專家們的意見紛歧前所未有，素來和凱因斯學派理論有差別的，以彌爾敦·佛里得曼(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固然不贊成卡特的對策，就是同屬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們意見也不一致，美國經濟發展到不能不有所轉變的階段，經濟思想也不能沒有新的發展，並略述各家意見以便比較。

註④ "Economy is Probably" in a Recession, Carter Says; Inflation Still Top Priority",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1980.
註⑤ 數字來源同註④。

佛里得曼認為，美國當前經濟問題在兩方面：膨脹和生產力下降。膨脹打擊投資，造成經濟的無效率；生產力下降又是膨脹的造因，兩者互為因果，因此，必須對兩種問題同時採取對策，任何有效對策必須包涵三個關鍵因素：第一是約束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率；第二是大量削減稅課並全面改革租稅結構；第三是減少管理和控制。關於第一點，佛里得曼說，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聯邦貨幣制度曾經宣佈將在三至五年內約束貨幣供應增加率使其和物價水準相一致，但是，作為和所說不相符合，關於租稅方面，可以分為有形和無形的兩種，人民所負擔的不僅是政府有形的租稅收入，同樣要負擔支出超過收入的赤字部份，因為赤字預算所造成膨脹就是無形的租稅，同時，不但要避免赤字而且要減少支出，假如政府支出六、〇〇〇億而達收支平衡，還不如支出四、〇〇〇億而有一、〇〇〇億的赤字。關於政府管制方面，一九七〇年代的管制風就是生產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應當撤銷工資與物價穩定理事會，佛里得曼代表美國最主張遵從自然經濟規律的學派，反對任何管制，只要保持貨幣供應量增加率和經濟成長率相配合就可以獲得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效果，這個理論近來獲得較多經濟學家的贊同，西德政府所採取政策就和貨幣學派理論相近。

僅僅對於反膨脹應否採取工資和物價管制措施這一問題，在接近民主黨的經濟學家們之間就有很多歧見。亞洲華爾街日報於三月四日在同一版刊出相對照的兩篇論文：一篇是海勒爾(Walter W. Heller)所撰，海氏曾任甘迺迪和詹森二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現任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另一篇是雪爾茲(Charles L. Schultze)講辭的摘錄，雪氏現任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⑥。雪爾茲反對工資和物價管制，認為強制性的管制既不是減低膨脹很快的也不是一定成功的方法。在美國有以百萬計的貨物皆須定價，諸如能源原料、勞動和環境管制成本的變動，當市場條件變動的時候，數百萬種貨物的價格都必須變動以適應每天的情況。美國有一千萬個非農業企業，每一個企業都必須定它自己的工資。沒有任何一套物價和工資強迫管制辦法能够正確的決定千萬種物價和工資使合時宜。因此，將發生兩種後果：(1)壓力日益增加使一種又一種的貨物不能不部份或全部放棄管制；(2)經濟成長受到干擾或損害日益增加，造成無效率、缺貨和成本與物價更上漲，這種後果在尼克森實行管制時期最為顯著，尼克森一九七一年後期實行物價和工資管制，在一九七二年初確見膨脹較前低一個百分點，可是到一九七二年後半膨脹率就更見惡化，到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物價較未管制前上升六個百分點。許多金屬，如銅、鋅、鋁和鉛等在國際市場的價格已經上漲而美國限價還是低於國際價格，因此造成美國市場缺貨，雪爾茲最後說：「克服膨脹只有長期的採取政府和私人的約束消費並長期實行增加供給和生產力的政策，但是在石油價格大量增加的影響之下，十年來膨脹加劇，將不能迅加控制，還須多年堅持的努力，硬性的工資和物價管制將不能達到穩定的目標，而徒然引導我們走進錯誤的道路。……」

海勒爾也承認採取管制政策須付出不小的代價，但是却認為如不採取管制政策則損失將更大。當一九七九年膨脹率達一三。

註⑥ Walter Heller, "The Case for Wage-Price Controls" & Charles Schultze, "Why Controls Don't Work",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4, 1980.

三%而一九八〇年一月膨脹更高達一八%的時候，使美國人不能再加檢討。首先要檢討，現在捨管制以外，其他政策過去未有成就，今後也不會有成就。其原因有四：(1)美國膨脹的可驚展望與紀錄；(2)衰退趨勢已不能使工資和物價隨之下降；(3)降低膨脹而採取「貨幣——財政政策」，其結果將付出重大代價——損失產量、工作、利潤和投資；和(4)自動約束工資與物價的衝擊力減少。至於不能不採取管制政策的理由則有如下各點：第一，膨脹年率達一五%到二〇%可能延展幾個月，即使減退也還要有八%到一〇%。換句話說，姑且不計石油、房屋和食物等近年來造成兩位數字膨脹率諸因素，還有膨脹的基本原因，那就是工資推動物價和物價又推動工資這種循環。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這種作用牽動膨脹率上升僅僅一%，一九六九——七〇的衰退以後增加到三%，一九七四——七五年衰退之後又增加到五%至六%，現在則接近八%。頑強的膨脹的無情算術指出，當計時工資增加年率達九%的時候，每小時的產量只增加一%，其結果使產品的成本推壓膨脹率有了八%的基本數。假使不能解決這一癥結，則任何克服膨脹的措施都不會成功。第二、在過去輕微的衰退可以抑制工資和物價的上漲，現在似已不如昔日。在龐大的經濟中顯見的事實是擴增工資和提高物價，這就使反膨脹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歸於無效。即使這種政策能夠削減消費者和企業的需要，也不能抑止成本推壓性膨脹的動力。主要的犧牲者是工人們，他們損失了工作機會；是公司，他們損失了利潤；是國家，他損失了總生產和生產力。第三、假使採取「財政——貨幣政策」，如要降低一個百分點，就必須犧牲二千億美元的國民生產毛額和三百萬個就業機會。一次又一次的研究確定了，僅僅靠「財政——貨幣政策」以克服膨脹，其犧牲甚大而利益甚微。第四、管制和財政——貨幣的約束應當相輔相成，財政——貨幣約束是降低經濟的血壓，而工資——物價的管制則是退燒，當能源和利息成本的上升仍然在經濟中流行的時候，一種絕對的凍結工資和物價對私經濟的要求將超過其所能提供，一個合理的目標是使目前九%到八%的膨脹率降為五——四%或四——三%，一年或兩年以後再撤銷管制，則物價不再會猛漲，海勒爾還說，反對工資——物價管制者常常舉尼克森管制失敗的事例，殊不知，當尼克森實施管制的時期却採取了減少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來擴張經濟，兩者矛盾，以致失敗。須記取，當杜魯門處理韓戰時期膨脹問題，一面管制物價，一面增加租稅以緊縮總合需要，所以當管制停止以後，物價就沒有反彈現象。海勒爾同樣重視供給方面，他說：「除了上述短期政策以外，至於長期的，全面的抑制膨脹，還要包括一些其他的長期的措施，諸如，以租稅刺激方式鼓勵投資和更普遍的支援研究工作，藉資發展工業生產力；減少工資稅；政府改進管理辦法，減少成本以提高競爭力；並減少進口限額以及其他貿易障礙。……」

現行經濟理論以調節商業循環為政府主要經濟任務，而調節的主要方式就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所得政策（即工資——物價管制），有人稱之為「三大法寶」，卡特政府三年來只重前二者，而對工資和物價採取指導原則，誠然，強制性管制阻力甚大而效果難以保證，雪爾茲是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所主張就是代表政府政策，海勒爾也曾經擔任民主黨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所本原理不會相差甚遠，只是認為目前膨脹已過高，必須以所得政策配合「財政——貨幣政策」纔能夠收到效果。同時，二

人都提到必須提高生產力，增加供給，纔能够根本解決膨脹逐漸增高的問題，却是近來美國經濟思想的趨勢。

供給面經濟學

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加上所得政策都難期有效克服膨脹，而且造成膨脹性衰退。經濟學家們不能不另覓蹊徑，晚近在美國出現被稱為「供給面」(Supply-side)學派。伊凡·密契爾(Michael K. Evans)撰文刊登於「挑戰」雙月刊一九八〇年一至二月號，題為「凱因斯經濟計量模式的破產^②」。開頭就說：「美國經濟是居於可悲的形態。膨脹率是戰後最高的，並且現在正處於衰退的開始階段，這次衰退可能比一九七四到七五年的混亂更為嚴重。失業和個人的破產急劇增加。美元的價值搖擺不定，而要仰賴於阿拉伯的統治者的一念之間。使各個人感不安的指數，膨脹率和失業率每個月都達到新的高峯。何以致此？完全的答覆要追溯到一九六五年。那時，美國試行在同一時期大量削減租稅，實行「大社會」(Great society)政策和進行越南戰爭。不過，更要歸咎於過去三年間的經濟政策設計者。當一九七六年後半，美國經濟既非完善也無病症。經濟成長年率低到三·三%，失業率似乎停止在八%。另一方面，膨脹率則由一九七四年的一二·二%劇降為平均五·四%。當卡特政府面臨這一套統計數字，認定他們所面臨的最主要，即使不是惟一的，經濟問題就是失業。……卡特政府的政策制訂者從單方面看美國的經濟問題，他們只顧治療失業率而置其他一切於次要。……」其結果，政府估計一九七八年的膨脹率是六·一%而實際為七·七%，估計一九七九年是七·六%而實際必在一一%以上。(按：勞工部已公佈為一三·三%)

伊凡認為卡特政府之所以估計錯誤，由於採取了「凱因斯的模式」(Keynesian models)所稱「凱因斯模式」並不是說每一模式都忠實的追隨了凱因斯在「一般理論」第二三六頁所寫的文字，只是指出，這種模式是符合凱因斯所發展的一般的信條。這些信條可以綜合如下：花費刺激總合需要而貯蓄則相反；當私人部門的需要遲滯，就必須以較大的政府花費來補充；需要的增加不會有顯著的膨脹效果；政府花費的增加，其對於經濟的刺激超過等量租稅的削減。由於過去兩年用這種模式去預測經濟不能獲得良好結果，因此近來發展了所謂「供給面經濟學」。從字面可以瞭解，其意義就是，經濟學家們必須計算及經濟之生產貨物和勞務的能力並計算及消費者 and 企業之購買它們的能力。假使所得增加而消費者花費更多，則除非生產能量迅速增加，其結果經濟將出現生產能量短缺和瓶頸。然而，供給面經濟學的內容遠較需要與供給之間的平衡來得繁複。

② Michael K. Evans, "The Bankruptcy of Keynesian Econometric Models", *Challenges*, Jan.-Feb., 1980, pp. 13-19. Evans is President, Evans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伊凡自我介紹是受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遵聘來建立一套供給面模式，他所已建立的模式就是依下列的設計。他認為，過去的年代裏美國經濟受困擾的基本問題在於生產力成長的緩落，這個緩落同時招致高膨脹率 and 低度國民生產毛額真實成長率。在戰後的二十年間，生產力（每一單位勞動投入的產出）的成長率，平均每年為三%。從一九七七年起，降為平均每年一%。與此同時，膨脹年率却由平均二%增加為八%，至於經濟成長年率則由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的平均四%減緩至三%以下。可是現行主要的經濟計量模式用來預測景氣和政策分析的，都不太重視，即使不是忽視了，在決定經濟的周遭環境中生產力所起的決定性的作用。所有變化只限於政府花費和個人與公司所得稅率，這只是從需要方面來決定其變化。顯然，需要導向（demand-oriented）的政策，遠不足以挽回生產力緩落的趨勢，並且已經加深了緩落的程度。另一方面，供給面經濟學却顧及財政與貨幣政策變動對於生產力和刺激的效果，例如，較低稅率不僅將透過提高可處置所得而增加花費，並且較低稅率將透過提高投資、生產力和勞動積極性而增加生產。

伊凡之所以說凱因斯模式破產，因為凱因斯模式會造成低生產力和高度膨脹。凱因斯說，需要升高，不論由於政府花費或轉移支付增加的刺激，則所投資本的報酬率將要升高，因為廠商每一單位的資本將生產更多貨物，如此，則廠商必擴展其生產設備，因之而增加生產能量，假如需要更多勞動力，則將以高工資率來吸引。如此則生產能量將和上升的總需要同一速度上升，而凱因斯的原理就完滿達成。伊凡認為，假使產出增加而其他與報酬率有關的生產因素不變，則情形確將如凱因斯所說。然而，儲蓄的減少將增加利率，高利率將減少資本——產出比率的均衡，因之將減少而不是增加投資。再者，假如廠商由於需要增加和勞動積極降低而需要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必將提高工資和單位勞動成本，致使膨脹率升高。膨脹率會減少成長率，其理由如下：第一、膨脹使個人的所得晉入較高所得稅級距，因此減少其可處置所得；第二、可處置所得減少使工資收入者要求更高工資使膨脹循環惡化；第三、由於利率升高實質投資報酬率降低而使投資減少；膨脹使出口貨更貴而進口貨相對便宜，乃使貿易地位惡化。伊凡提出供給面的理論來批判凱因斯模式。為增加供給就必須提高生產力。關於怎樣提高生產力，則在下節中加以討論。

生產力問題

生產力成長遲緩，必須加速投資的主張不是現在纔開始。當尼克森執政，韓福瑞擔任國會兩院經濟聯席委員會主席的一九七四年前後就已經注意到怎樣減低公司所得稅率，提高投資意願，充裕金融市場可貸資金等等。然而，由於一九七三到七四年的石油價格猛漲，衝擊力過強，一切政府和企業的努力都在於如何吸收這一強大的衝擊力，以克服戰後谷底最深和歷時最長的衰退，

而將生產力問題置於次要地位，所以儲蓄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毛率在一九六五——六九時期平均為一五·八%，一九七〇到七四時期平均為一五·一%，一九七五到七七時期降為一三·八%，一九七八到七九恢復為平均一五·三%。察其原因，是聯邦政府在一九七五——七七時期的負儲蓄（預算赤字）達國民生產毛額三·三%，而其他三個時期則負儲蓄分別為〇·二%，一·二%和〇·八%。與儲蓄率相對應的，這四個時期的毛投資率則分別約一五·八%，一五·三%，一四·二%和一五·五%。美國的投資率一向較其他主要工業為低。美國政府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資料發表與其他六個工業國的真實固定投資率之比較，在一九六六到七六之間，依比率大小序，日本為二六·四%，西德為一七·四%，加拿大為一七·二%，法國為一六·七%，英國為一四·九%，美國殿後為一三·五%。因為投資率低，所以生產力成長率也低。根據同一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到七三的生产力成長率，日本為八·七%，西德為四·六%，法國為四·六%，義大利為五·四%，英國為三%，加拿大為二·四%，美國殿後為一·九%。在一九七三到七九的時期，日本為三·四%，西德為三·二%，法國為二·七%，義大利為一·六%，加拿大為〇·四%，美則僅〇·一%^⑧。生產力的決定因素雖然還包括勞動力的教育水準、年齡和性別的結構，保衛環境支出和法令限制等等，但是主要的還是固定資本形成。

卡特政府對於鼓勵投資也不是無所作為，一九七八年的歲收法案（The Revenue Act of 1978）將公司稅的最高稅率由四八%降低為四六%，並且將兩個級距改為四個級距，使須納最高稅率的淨所得不是五萬而是一〇萬，並使投資扣抵成為永久的制度，還有其他鼓勵辦法。雖然如此，一九七八年企業固定投資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是一〇·五%，而一九七八年却反而降為一·七%。顯然，租稅獎勵的效果不彰。據美國政府解釋，是由於剩餘生產能量逐漸增加而經濟擴張步調減緩使利潤邊際縮小所致。卡特政府深知生產力成長緩落是美國經濟的病根所在，但是，所自述以提高投資率以促進生產力的作為也僅限於此。

美國專家們討論生產力問題頗致力於成長率緩落原因的分析。本文目的則在探討如何提高生產力成長率，增加供給以平抑膨脹率。生產力問題專家溫粹克（John W. Kendrick）於一九七六年為國會經濟聯合委員會提供論文，題目是「生產力趨勢和展望」^⑨，其內容到現在還是常被引述。溫氏的建議是一方面採取租稅鼓勵方式，提高稅後所得以鼓勵投資，俾可加速固定資本形成，不但要增加資本的量而且要提高生產設備的技術水準，他所主張的租稅鼓勵，包括公司稅與個人所得稅的逐漸合一，以消除對於紅利重複課稅的現行制度以及加速折舊率以減少稅負。另一方面，溫氏強調研究與發展的重要，以科技的發展配合資本形成以促進創新。

註⑧ 以上數字同註①及一九七九年一月同樣經濟報告。

註⑨ John W. 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and Prospects", U. S. Economic Growth From 1976 to 1985: Prospects, Problems, and Patterns, Vol. 1-Productivit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18.

緩。

- 前述伊凡論凱因斯模式的破產，認為克服膨脹必須從供給面努力，提高生產力，增加產品供給。對此，伊凡提出十點辦法：
- (1) 降低稅率以增加私人儲蓄的意願，其方法是增加個人所持有資產的報酬率。高度儲蓄可以使利率降低而投資增加。
 - (2) 削減公司稅率或類似方法，諸如增加投資的租稅扣抵或放寬折舊提存，以增加稅後報價平均率來直接改善投資率。
 - (3) 高度投資率導致增加生產力，使每一投入單位生產更多的貨物和勞務。其結果，單位成本不至提高如此之快而膨脹率趨緩。
 - (4) 將資源由公共部門轉移到私人部門可以全面增加生產力的成長率，由於公共部門的生產力增加較小或全不增加。
 - (5) 削減租稅所造成快速生產力成長率可以提供所需生產能量來生產更多的貨物和勞務，於是導致無缺乏無瓶頸的平衡成長。
 - (6) 低稅率使要求工資增加較為溫和，因為減稅使工人們的真實所得增高，並且避免因所得升入較高稅級而真實所得受損失。
 - (7) 低膨脹率使真實可處置所得增加，消費、產出和就業也隨着增加。
 - (8) 低稅率可以促進勞動積極性，因而提高工作的量和質。這將更為增加生產能量，進而有助於減緩膨脹率。
 - (9) 低膨脹率將使淨出口增加，轉而加強美元價值。這將進一步降低膨脹率，由於進口的量減少而不增加進口貨的價格。
 - (10) 生產能量的增加同樣得以生產更多的貨物以供出口以及國內的消費，因之更加強美元而減少進口膨脹^⑩。
- 以上所列十點，無非削減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和其他方面的主張並沒有顯著區別。不過伊凡說：不能再如一九七七年那樣減稅而不約束政府花費。私經濟部門因減稅而形成的儲蓄將被公經濟部門儲蓄的減少所抵銷，使無餘資可供投資之用。因此，減稅必須在以後幾年中削減或至少遲緩政府花費的增長率。這是舊式的凱因斯模式所不能接受的，這却是伊凡主張的特點，減稅和約束政府花費是爲了提高儲蓄率，充裕投資所需資金，故此稱爲「供給面」的經濟學。

伊凡主張似較溫粹克更見體系完整，除了以租稅政策刺激投資意願以外，更注意及資金的來源，使投資意願能以實現。

綜 論

遍讀美國專家的分析，似乎都忽略了一個事實，當前石油漲價的困難是所有石油輸入國都遭遇到的，僅就工業國比較，日本所需石油依賴進口的達九九·七%，西德達九八%，而美國尚不及五〇%。至於其他天然資源，美國所賴於進口的也較低於其他工業國，何以，當前美國的膨脹率高於日本、西德和法國甚至於義大利，而經濟成長率則低於這幾個國家？所以必須從美國經濟

註⑩ 同註⑦資料。

美國經濟前途決定於生產力

本身來尋找原因。從上文所舉數字看，立可發現是由於美國由人民到政府的消費率太高而儲蓄率在七大工業國中為最低，其直接影響是生產力增加率也是最低的。何以儲蓄率低？信奉增加總合需要可以提高經濟成長率的理論是其原因之一，次之，人民過分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也不能不說是另一原因。生活水準是受生產力的決定，以貿易的入超來增加供給其效力是短暫的。據美聯社的報導，美國勞工部計算，一九七九年製造業勞工的報酬，包括所有福利在內，每小時平均工資在美國為九·〇九美元，比利時為一一·三〇，荷蘭為一一·三一，西德為一一·三三，瑞典為一一·三九，低於美國的則有日本的五·四八，英國的五·四六，義大利的七·三八，加拿大的七·九七和法國的八·一七美元。當一九六〇年時，美國每小時平均工資為二·六六美元，差可相比的只有加拿大的二·一二美元，其他國家則不及美國的半數，日本則只有〇·二六^⑩。看這些數字的變化可以深知生產力變化影響之大。

其次，為提高生產力增加率，美國決策者和專家們的主張似乎都只限於運用租稅政策而缺乏其他辦法。事實上，在其他實行計劃性自由經濟的國家，沒有不發揮政府力量從事推動經濟政策，例如，日本慣例在實施經濟政策時，除了透過市場制度以外，常由政府、企業和勞工共同根據展望而採取行動，不完全依賴現實短暫利益的刺激來運用「看不見的手」。例如，我國也可以不顧短期間國際呆滯的環境，而由政府運用國際資金從事建立企業，準備發展到能夠有純利時，透過發行股票方式轉移民營。美國是自由經濟國家中最泥守市場制度原則的，所以限制了政府在經濟上的職能。

美國幸福雜誌助理執行編輯包文(William Borwen)著文：「生產力：一個重要的指標^⑪」，估計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美國生產力增加年率平均為二·一%，優於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九的平均〇·八%，恢復到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三的平均二·一%，但仍不如一九四七到一九六六時期的三·二%。他說：但是，壞的是，即使恢復到二·一%還是不夠的，因為這樣還不足以在國際市場和主要的競爭對手相抗衡，無法使美國挽回其競爭地位的劣勢。作為一個國家最好要在一九八〇年代努力推進其生產力成長年率到二·一%以上。要達到多麼高？二·五%還不能鼓舞任何人，為何不試圖恢復到三·二%。」又說：「尤有進者，在一九四七到六六時期，享受廉價能源，而當一九八〇年代，生產力要負擔高能源價格。在這種條件之下，一個三·二%目標的生產力成長率似乎完全不切實際。但是，也許這個目標不是全然無法達到的，假使美國政府和人民鄭重的選擇這個目標作為國家的主要目的。……」包文顯然也是認為，有計劃的努力是必要的，不能一味聽命於經濟的自然規律。這個決心是否能建立，將決定美國今後經濟的前途以至國家的地位。

⑩⑪ "European Workers Earn 25% More Than U. S. Counterparts", *China News*, April 7, 1980.

⑫ William Bowen, "Productivity: A Vital Indicator", Courtesy of Fortune, Economic Impact, 1980/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U. S. A.